

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史序说：研究综述、理论基础与历史分期^{*}

肖 鹏

摘 要 民国时期的中美图书馆交流史不仅是理解中国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缘起的重要议题,在回应图书馆领域史学研究的“双重困境”方面,也具有其特殊的价值。梳理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史的相关文献和研究主题发现,本课题难点在于庞杂的线索、社群与诸多政治、经济因素的介入等。由此,本研究吸收“世界体系理论”“书籍交流圈”等跨学科的思想和方法,提出一个由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组成的理论视角,并阐述这一理论视角如何转化为具体的研究方法,以提高学界对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史研究的整体理解和把控能力。研究发现,“专业交往”到“文化外交”的视角渐变是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的核心轴线,以此可以将这段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帮助我们把握不同时期的交往脉络、主要成就和基本特点。表1。参考文献73。

关键词 图书馆史 中美图书馆 图书馆交流 中美关系

分类号 G259.1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Libra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Literature Review, Knowledge Base and the Division of Historical Periods

XIAO Peng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libra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is an important topic for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 of China's librarianship and Library Science. It also may be of particular value in dealing with the poverty of history research in Library Science. As a study focusing on the big picture, the article collects and analyzes related literatures and divides them into different topics including: 1) America's influence on the Library Science and librarianship of China; 2) China's influence on the Library Science and librarianship of the United States; 3) Sino-American library communication o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plomacy; 4) Research on significant figures; 5) Other relevant research. On the foundation of literature review,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difficulties of this study mainly come from the

^{*} 本刊“青年学术论坛”特约稿(Special contribution for the Youth Academic Forum sponsored by this Journal)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图书馆学史专题研究:中国现当代图书馆学史研究”(编号:13AZD066)的研究成果之一。(This article is an outcome of the project “The Special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a's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brary Science” (No. 13AZD066)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通信作者:肖鹏,Email:xiaop25@mail.sysu.edu.cn, ORCID:0000-0002-6668-8122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XIAO Peng, Email:xiaop25@mail.sysu.edu.cn, ORCID:0000-0002-6668-8122)

complicated clues, the numerous figures and many other unexpected macro factors involved in the historical facts. It's necessary to bring up a suitable analytical frame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the paper, the World-system Theory of Immanuel Wallerstein and the concept of communications circuit developed by Robert Darnton, along with other theories and concept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are brought into the research of libra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construct a three-layer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the meantime, fundamental concepts such as "American Library Model" "Library Communication" "Cultural Diplomacy" and "Professional Activity" are also discussed and defined. Guided by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t the last part, the history of the Sino-American library communication is divided into four phases. 1)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in 1925. It's a phase when American library model gradually accepted by Chinese. 2) From 1925 to 1937, the year when Anti-Japanese War broke out, a phase when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dominated by professional power, especially the trained librarians from both countries. 3) From 1937 to the beginning of 1943, there sees the transition from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to 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libra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specially after 1941, when the Division of Cultural Relationship (DCR)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tarts to focus on Asia. 4) From 1943 to 1949. It's a phase begins with *Memo: Sino-American Intellectual Relations*, drafted by Yuan Tung-li and John K. Fairbank, which offers a model of cultural and library activiti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Following the memo and guidance of DCR, ALA develops its China Projects. However, under the shadow of war and the ever-changing Sino-American relation, the China Projects only succeeds in limited fields such as book exchange and donation. 1 tab. 73 refs.

KEY WORDS

Library history. Libra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Library communication.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0 引言

近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界史学研究收获颇丰,尤其在图书馆人与图书馆机构的成就评价、关键事件纪念和回顾、重要著作的价值重估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这些议题多集中于微观层面、侧重史料的铺陈,至于宏观事业史层面,虽持续有《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2014)、《中国图书馆史》(2017)等著作面世,主要持之以描述性视角,在整体性分析与理论构建方面还有较大的空间。应该说,微观与局部研究的经年沉淀,为图书与图书馆史的理论创造与概念提炼奠定了一定基础,目前的研究触角往往固守在有限的学科范围之内,并未充分融入更为宏大

的学术潮流之中,进而导致在“图书与图书馆史”的跨学科对话中,图书馆学领域的学术话语日渐式微。

这一趋向牵引出两个棘手的问题:①图书馆学人在图书与图书馆史,特别是近代图书馆史的研究方面越发成熟,却逐渐显露出与主流研究范式、问题意识及学术话语的脱节。人文、社会领域的学者已然切入分类法^[1]、阅读史^[2]、印刷史^[3]、拓工史^[4]、造纸史^[5],乃至工具书^[6]等诸多课题,他们颠覆了我们所熟知的诠释模式,铺开新颖的学术图景。作为图书馆学领域的史学研究者,我们急需思考的是:如何把握和内化这些新兴的研究理路,进而构建具有独特学科立场的解释系统。②图书馆学领域的史学研究对学科与实践支撑功能日渐衰弱。在

“求真”(为学问而学问)与“致用”(为变革现实而研究历史)这两个传统的治史旨趣^[7]之中,本学科无疑更倾向“致用”一侧。例如,在中国图书馆事业百年之际出现的一系列人物史、思想史研究,便在历史的回顾与追溯中再造了当代公共图书馆精神^[8-9],对新世纪以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影响深远。可惜的是,直到近年,传统图书馆史研究仍偏重人物、机构、事件的梳理和总结,问题意识日益钝化,结论也大多趋同,图书馆领域的史学工作已越来越难以帮助学界与业界深化对“图书”与“图书馆”本质的认识,提升对图书馆事业的理解深度。我们迫切需要拓宽视域、引入综合的跨学科的视角,从局部、线性的研究理路转入系统性、立体化的观察路径,加强图书馆史研究对学术与业界的支撑功能。

在这一情况下,笔者选择“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史”的课题,除了其本身的研究价值,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上述两重困境的回应。一方面,从1912年到1949年,以两次世界大战为关键节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风起云涌,世界体系(World-system)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古与今、中与西、帝国与殖民、全球化与民族化等成对观念互相碰撞、交错斑驳,使得这一时期成为当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受关注、最为活跃的历史时段之一,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沉淀,在这一时段展开相关课题的研究,有望将这些理论成分吸纳到图书馆史的体系之内。另一方面,民国时期的中美图书馆交往深刻地形塑了此后中国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面貌,至今余音尚存,而此项研究对于学界与业界也有望产生特殊的“致用”价值,譬如“图书馆之于文化交流的作用”“文化外交视域下的图书馆事业”等议题,对“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文化走出去”等当代战略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也可为图书馆的价值阐述与功能发掘提供新的视角。

作为一项“序说”式的研究,本文主要讨论以下三个方面:①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的文献综述,了解当前的局限,探索后续研究

的立足点;②构建可用的理论基础框架,尝试为本课题建立上文述及的“系统性、立体化的观察路径”;③简要剖析中美图书馆交流史的发展主轴与历史分期,明确每一阶段的时代背景、重要事件与关键议题,并密切关注各个阶段如何实现过渡与转折。

1 文献综述

尽管只要涉猎近代图书馆史,就或多或少都要触及中美图书馆间的交往纪事,但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史目前尚缺乏系统性的梳理。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研究所涉文献既多且杂,囿于篇幅,笔者仅挑选其中最为关键的主题或当前议论较少的内容展开阐述,许多相邻地域^[10]、相近时域^[11-12]或相关领域^[13-14]的研究成果未能在本文中充分列举。

(1)美国对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和图书馆事业的影响

回顾严文郁^[15]等对民国时期中外图书馆关系的梳理,可以发现,尽管所谓“交流”是相互的,美国对中国图书馆学理念与图书馆事业的影响却无疑是这一交流关系中的主旋律,包括鲍士伟来华^[16-17]、庚款退还^[18]、美国图书馆协会援华^[19-21]等历史事件,均展现了民国时期美国对中国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影响。在一系列相关研究中,程焕文较早奠定了基础性的分析框架^[22],吴稼年^[23-24]、陈英^[25]等学者也从总体或特定的研究视角展开了观察;李刚等专门讲述了以留学生、翻译著作和国际及境内外学术交流三个主题为中心的中外图书馆学交流^[26],这一研究汇集了麦群忠^[27]、顾焯青^[28]、范凡^[29]等的研究成果,并有所增补,是比较全面的回顾。

总体上来讲,现有研究的解释路径或多或少与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相契合,如有学者甚至直接点明,中国对现代图书馆制度的接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部力量的干预与一定的偶然性因素造就的^[30]。在这种相对一致的解

释模式下,涂光霁的研究^[31]便显得颇为特别,其博士论文选取了埃弗雷特·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用以诠释从1898到1947年期间美国图书馆学在中国播种、扎根的全过程,尝试挣脱传统上“从仿到创”这类固化的解释路径。

以上研究多采纳宏观的观察视角,也有不少研究聚焦于图书馆事业的某一方面,从特定主题探索美国对中国图书馆界的影响。其中,最常涉及的两个领域分别是:①图书馆教育。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的教育交流主要依赖留美群体的知识流转,因此本主题的论著颇多,尤其关于文华图专的相关研究更是学界的焦点所在^[32-34];而近年如郑丽芬^[35]等,开始用及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档案等一手材料,大大深化了相关研究内涵。②图书馆技术。现有论著十分清晰地勾勒出一条从“沿袭欧美”到“本土创造”的图书馆技术方法(尤其是分类法)发展路径,成果丰硕,这里不再赘说。但是,“技术交流”应当涵盖从“技术方法”到“技术设备”的全面谱系,除了技术方法的交流,也要包纳书架、缩微胶卷等技术设备的交流,尤其后者,是当前研究的盲点,只有刘劲松等少数学者^[36]做出了探讨。

(2) 中国对美国图书馆学思想和图书馆事业的影响

与美国图书馆理念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影响相呼应的,还有一条中国图书馆事业对美方反向影响的线索,除人物研究之外,目前相关文献数量较少、也相对零碎,这里主要简述北美东亚图书馆及相关机构的研究。北美的东亚图书馆(Asian Library)早期称远东图书馆(Oriental Library),主要是为支撑美国、加拿大对日、韩等亚洲国家的研究而成立,是中国图书馆界对美国实现“知识反哺”的重要机构。东亚图书馆的总结性著作有周欣平的《东学西渐:北美东亚图书馆(1868—2008)》,该书对各所东亚图书馆的历史源流、馆藏情况、相关学人、资金来源等论述颇为详尽^[37]。另外便是吴文津新近出版的文集^[38],其中汇集多篇相关论文,并将韦棣华、

袁同礼、芮玛丽、费正清等人物与各图书馆的发展历程互作经纬,织成一副全景。值得一提的是,吴书的序言为著名学者余英时所撰,该文与他所写的另一篇序言^[39],从宏观学术史角度略述了北美东亚图书馆的价值与贡献。

(3) 文化外交视域下的中美图书馆交流

从文化外交的角度考察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是本课题中尚未被充分开发的关键主题之一。晚清时期中美之间的图书交流如中美图书交换机构的设立^[40-41],已经属于国家间文化交往的范畴,但严格来讲,文化外交视域下的中美图书馆交流始于二战之后。费慰梅(Wilma Fairbank)记录了1942至1949年间美国政府在中国开展的文化活动和项目,有部分内容与图书馆界关系密切^[42];而所述最为详尽者,当为Gary Kraske^[43],其著作全面剖析了美国图书馆协会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尤其关注1938年到1949年之间,图书与图书馆如何逐渐成为美国开展文化外交的重要媒介,其中,中国方面的论述占据了一个单独的章节。国内涉及二战前后文化外交与图书交流的叙述,大多引自此书,如胡文涛^[44]和孙洋^[45]的研究。其中,孙洋又专门将美国对华图书援助置于美国整体性的对话政策与行动视角下进行观察,具有一定的价值。

(4) 相关的人物研究

中美图书馆交流中牵涉的人物数量极为庞大,总体上可划分为四类:第一,关于传教士与在华的外籍图书馆人的研究,如韦棣华^[46-47]、克乃文^[48]等;第二,中国图书馆界或相关社群中与美国有较为密切联系的人物的研究,如袁同礼^[49]等;第三,与中国图书馆界有密切关系的美国图书馆员或学者的研究,如卡尔·米连^[50]、鲍士伟^[51]等;第四,关于当时华人图书馆员或在美学者的研究,如裘开明^[52]等。

通过简略综述可以发现,这一课题尽管有坚实的基础研究,但总体上还未进行系统的爬梳,更鲜有打通中美双方视角的议论;一些举足轻重的议题如图书馆的跨文化功能、技术与设

备交流史等,未曾展开充分的探讨;资料的发掘还不够充分,部分研究即使用到一手档案,多止步于史实的梳理;国际图书馆学或跨国图书馆交流中的许多核心概念,也还未见严格的澄清与界定。这些都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切入的角度。然而,通过综述也可发现系统展开这一课题的棘手之处。民国时期的中美图书馆交流史本身就有着庞杂的发展线索,旨趣相异的交流群体,再兼及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事宜,令人眼花缭乱,在论述与逻辑上很容易四分五裂、顾此失彼。正因如此,有必要事先对这一课题的特质展开分析,构建一个合适的观察视角与可用的理论基础,同时理清历史的发展脉络。

2 理论基础

2.1 对适用理论的考察与反思

并不是脱离了所谓的“理论基础”或“解释路径”,研究者就无法做出兼具逻辑性与生动性的历史诠释。“理论”的意义是指导性的,它的作用是在我们茫然不知所措时提供观察的方向,为相对肤浅的认识提供纵深的可能。基于这一观点,在笔者看来,本课题对理论基础的诉求具体体现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

首先,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的大框架是中美互动,因此,我们应当建立对这一时期宏观世界结构及其政治、经济、社会特征的基本理解,这是课题宏观层次的理论需要。其次,作为图书馆学领域的研究者,本课题最终的落脚点仍是微观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学,因此,必然要明确宏观的政治、经济、社会要素如何与微观的图书馆活动发生关联与互动,为之探寻一个基本的解释路径,是为中观层次的理论诉求。再者,在图书馆学已有研究中,对于与本课题相关的部分重要概念尚未明晰,则要展开进一步的梳理和剖析,这便是微观层次的理论诉求。其中,宏观与中观层次的理论基础当着重吸收和化用相对成熟的跨学科研究成果,这一“吸收和化用”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正是与“主流研究范

式、问题意识及学术话语”重新建立关系的过程。

“中美图书馆交流”这一主题的特殊性,使得其在宏观与中观层次可用的分析理论与框架之多,令人咋舌。首先,如果将图书馆和图书馆界视为跨国文化交流的载体或媒介,便可援引地缘政治、国际关系、传播学、经济学等诸多理论。其次,如果着眼于图书馆交流所引致的知识、文本与观念碰撞,则可将本课题置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福柯、布迪厄为代表的后现代视域之下。再者,在历史人类学与文化史学学者所开拓的“新书史”研究中,这一课题也有望找到合适的理论依托——虽然在罗伯特·达恩顿著名的书籍交流圈模型(The Communications Circuit)的叙述中并没有过多谈及图书馆的角色,但“新书史”的学者们常常把藏书和图书馆视为书籍史研究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如《剑桥书籍史指南》中,第二章即为Karen Attar撰写的“图书馆中的书籍”^[53];与“新书史”关联密切的“历史表现”(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54]“互文性理论”(Intertextuality)^[55]等专门理论的出现也为这一角度的理论化建设提供了可能。

2.2 一个融汇宏观、中观与微观的理论视角

经过梳理与分析,笔者试图综合来自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 Theory)、书籍交流圈与现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成果,提出一个适用于本课题的整体性理论视角(见表1)。借助这一视角,当我们进入中美图书馆交流史的研究时,便能更好地把握这段历史的多个层次和不同内涵,发掘其主要脉络。下文将依据这个理论视角展开阐述,并结合本主题的研究进行分析。

2.2.1 宏观层次:世界体系理论

对于民国时期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格局等宏观背景的理解,本研究主要借用了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其后由Amin、Frank等学者系统阐发的“世界体系理论”^[56]。该理论源于对“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的反思,由于现代化理论多只关注国家纵向的

表 1 一个融汇宏观、中观与微观的理论视角

层次	理论体系	来源	目的
宏观	世界体系理论	政治学、历史学	解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
中观	书籍交流圈	文化史、书籍史	将图书馆事业与政治、经济、文化要素 联系起来
微观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与 基本概念	图书馆学、信息学	在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的话语体系 内明确界定相关概念

发展历程,对于国际间横向结构关系的认知有所缺失。20 世纪 60 年代起,从社会学领域开始,出现了一场对现代化理论中“纯以国家为分析单元”“线性的发展路线”等弊端的反思,世界体系理论是基于这些反思,并深入吸收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后形成的系统化理论构建。

这一体系对于本主题而言,最具价值的在于其“核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分层。该理论以现代世界的“不平等的剥削”作为出发点,从经济的商品链着手,将“世界体系”中生产核心产品(即使用高工资的熟练工人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地区称为“核心地区”,将生产边缘产品(即生产劳动密集型、低工资劳工生产的产品)的地区称为“边缘地区”,而“半边缘地区”则是同时生产两种产品的地域。在这种结构下,相对边缘的地区受到相对中心地区的支配,如“边缘”之于“半边缘”、“半边缘”之于“中心”;各个国家的地位、权力取决于它们在这一世界结构体系中的相对位置,“发展”或“衰落”的本质是“位置”的动态游移。“世界体系”的论述最早是基于经济和政治层面的,而这种三层结构也可对应到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层面,显然,核心地区的文化输出往往与其政治、经济的主导地位结伴而行。

基于这种结构化的宏观理论,我们有望更深刻地理解晚清民国时期宏观格局的变迁,包括中国、美国各自在世界体系中位置的变化,中美之间的政治、经济话语强弱,其他国家中美关系的影响等等。

从一个具体的案例来分析。譬如,为什么中国在接受美国图书馆思想的历程中,先是通过日本实现了间接接触?这一问题的回答,也许要先从 19 世纪末世界体系的宏观格局切入。其时,中国已经从“中心”落为“边缘”或“半边缘”地区,美国正从“半边缘”向“中心”的位置靠拢,由于两国在地理位置上的隔绝,这种“中心—边缘”的关联度很低。可是,当我们把日本加入分析范围之后,情况便大有不同。日本的特殊性体现在,这一国家在“脱亚入欧”的思想主导下,它作为“边缘/半边缘”地区与美国这一“中心”建立了关系;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明治维新以后,其在东亚政治体系中的地位逐渐从“边缘”上升到“半边缘”,成为这一地域内影响力输出的相对中心,又与中国这一“边缘”地区建立了关联。这种情况下,日本成为了中美“中心—边缘”链条之间的一个“半边缘”地带(纯粹从东亚政治经济的视角看来,日本又可视为本地区“中心”),在客观上造就了传播的契机。进一步来讲,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能够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形成桥梁、可能将“美国图书馆模式”带入中国的,似乎不仅日本,譬如俄罗斯,还有已经在中国耕耘许久的英国,都应当有此潜力,那为什么是日本完成了这一工作呢?这便涉及到中观层次的问题。

2.2.2 中观层次:书籍交流圈及相关理论

宏观的世界体系格局无疑会对微观的图书馆活动产生制约和影响,但真正的问题是,这种制约和影响是如何实现的?反过来讲,图书馆的运作又是怎样与国家、世界层面的宏大叙事

紧密联系起来的?熟悉图书馆学的研究者想必十分了解,这种“以小见大”或“以大见小”的论述,极易沦为空泛的意义总结或价值陈述。

在本系列研究中,为了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宏大背景与实践的图书馆体系连接起来,笔者在中观层次引入了以“书籍交流圈”模型为中心的新书史研究视角。关于“书籍交流圈”的介绍很多,严格来说,它并不是一套理论,而是研究建议或研究指南。这一模型认为在作者之外,出版商、贩运者、销售者、读者对文本生产都有重要的影响,将多种参与力量合观,才能勾勒出书籍生产的社会化过程;又强调,当我们切入图书史的研究时,虽然有繁多的路径和方法,核心却应该放在这一社会化过程之上,要着力探究“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也要研究这整个过程,整个过程在不同时间地点的表现形式,以及它同周边其他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57]。

在理论基础中加入以“书籍交流圈”模型为代表的中观视角以后,我们可大致贯通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窒碍;宏观世界体系及其中的政治、经济、军事元素很多时候并不直接影响图书馆,而是先影响书籍、知识和文化的社会化生产过程,进而触动图书馆事业,反之亦然。

仍延续上文关于日本间接传入“美国图书馆模式”的分析。尽管从宏观的世界体系来看,日本不是唯一有潜质在中美之间传导影响力,为中国最早带来系统化的“美国图书馆模式”的国家,但综合中观的书籍网络进行观察,这一“职责”几乎非日本莫属。原因在于,中日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存续多年的知识交流网络。

例如,在第一次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仍是东亚政治体系的中心,日本即是通过中国书籍来接受西方文化的。利玛窦于1605年5月9日在北京写给德·法比神父的书信中,就提到:“我们得到一件颇感欣慰的消息:即我们在中国用中文撰写的书籍,在日本也可使用;因为日本的文字、书籍、科学等全从中国输入,因此为我们信仰的传播不无裨益,因为这样日本人可知

我们的信仰已传入中国了。至论中日文字,虽然发音不一,会用中文撰写的不多,但看懂没有问题……”,在日本传教的巴范济神父等意识到利玛窦所出版中文文献的价值后,便要求利氏寄去其在中国出版的书籍,因之随后寄去的一系列图书,按利玛窦的叙述,有“《额我略历书》、世界地图、论友谊、尤其《天主实义》”^[58]。这种从中国到日本的书籍与知识流向,直到第二次西学东渐的早期,即林则徐、魏源等翻译西方图书的时候,依然成立。在明治中期即1885年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日本完成了独自接受西方新知识的历史转变;另一方面,停滞不前的中国社会已经无法继续向日本提供新的西方知识……”^[59]。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迅速成为中国的榜样,在这条书籍与知识的脉络上,传播者与接受者的位置出现了逆转,形成了日本对中国的知识输送途径,但是,这一网络本身并没有变化。

再进一步举例。民国时期的中美图书馆交流中,宏观的中美关系对图书馆事务的作用其实更多体现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的时期:政治方面,当美国在租借法案和军事活动方面“亏待”中国时,美国在华的文化机构及其图书支援成了一种补偿^[60];经济方面,如战争时期中国的通货膨胀与中美货币汇率的变化,左右了当时袁同礼帮助美国图书馆在华图书购置活动^[61];战争方面,交通闭塞致使战时美国援助中国图书的运送路线不断变更^[62]。宏观的大趋势,往往先是影响了图书支援的动机(政治力量)、图书的购买力(经济力量)与书籍的实际获取机会(战争力量)等事宜,等到图书馆与上述链条中的“书籍/图书”产生互动(入藏、接受、借出等)时,才与真正宏观的政治、经济力量发生关系。

总的来说,“书籍交流圈”在中层角度的观察,可以与“世界理论体系”连接,进而帮助本系列研究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解释系统。需要说明的是,宏观政治、经济要素能够带来的影响绝不止于书籍交流网络,还影响并作用于货

币网络、人力资源网络等等,也绝非只有这一网络才能将宏观事宜与微观的图书馆概念联系起来,考虑到课题本身的繁复性,优先抓住事物的根本才是关键,这里暂不叙及其他的关联问题。更重要的是,“书籍交流圈”不仅仅能够将图书馆带入宏大的社会文化体系之中,它明确以“图书生产”和“知识流转”为中心,直面图书馆史最基础的研究对象,这是其他潜在的“网络”或“交流圈”所不具备的特征。

2.2.3 微观层次:5个核心概念的界分

如果说,宏观视角提供关于世界格局的基本观点、中观视角提供关于书籍交流网络的认识,那么,到了微观视角,我们观察的重心又回到图书馆与图书馆学。微观层次的理论工作,主要是建立本课题勾连史料过程中的核心概念。对于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史而言,其核心概念主要有5个,即图书馆交流、专业交往、文化外交、民国时期、美国图书馆模式。

(1) 图书馆交流

“图书馆交流”是中美两国图书馆界、图书馆学界之间互动的总体概括。事实上,已有的跨国图书馆学研究,很少采用“交流”(Communication)或“关系”(Relationship)之类的说法^①,比较常见的术语是交换(Exchange)或合作(Co-operation),如“图书交换”(Book Exchange)和“图书馆合作”(Library Co-operation),这些概念显然更贴近事务型的工作,透露出图书馆学根基牢固的实践取向。本研究之所以采纳“图书馆交流”,其目的是涵盖以上诸多词汇的内涵,构建一个更具包容力、涵盖范围更广的概念体系。

(2) 图书馆的专业交往与文化外交

与“图书馆交流”密切相关的是“专业交往”与“文化外交”两个核心概念。当我们以学科内部的视角和话语来观察“图书馆交流”时,关注的主要是图书馆的理念、工作方法、技术、馆藏

资源、人才、学术等交流过程,这一角度,在本研究中被归为“专业交往”;而如果从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视角来看,图书馆的交流活动又是不同国家和权力之间互动的方式、手段,属于“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63]中的一环,这一视角则被归入“文化外交”的范畴,需要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文化外交”不同于政治领域的传统提法,其阐发与“图书馆交流”这一前置概念密切相关。

“图书馆界的专业交往”和“基于图书馆的文化外交”同样属于“图书馆交流”的范畴,只不过其侧重视角有所不同(一是从学科角度,一是从国家政治角度),它们不是非此即彼、泾渭分明的两个事物。在图书馆交流中,文化外交往往会以专业交往的形式呈现出来,而即便最纯粹的专业交往,也往往会夹带着政治与其他力量的影响。区分这两个概念的意义在于,从民国初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中美之间的图书馆交流随着交流动机和交流主体的变化,逐渐发生了“从专业交往向文化外交”的整体转变,这是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史的核心线索。

(3) 民国时期

本研究在时间范围上采用“民国时期”,而不使用“1912—1949”的时间界定,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它凸显笔者的基本立场仍是中国化的,尽管强调全球史观、同时牵涉中美两国,本研究主要还是立足并服务于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发展,以期从过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其次,“民国时期”虽然是一个“中国化”的历史阶段,但随着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体系,这一时间概念对于世界格局的影响力也在日渐加强。如果说“民国时期”开启时还没有充分引起美国社会的高度注意,那么可以说,“民国时期”的终结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连绵的回响,对于美国的政治走向和文化政策则更有深远的影响。“中华民国”从一个中国时间向世界

^① 例如“Communication”的概念,在图情领域更多用于图书馆内部关系的处理和信息社群的学术沟通,典型者如密歇根大学前图书馆馆长 Donald E. Riggs 的著作 *Library Communication: The Language of Leadership*。

时间的转变,凸显了中国在全球格局中影响力渐渐强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恰恰暗合本研究的主旨。

(4) 美国图书馆模式

“美国图书馆模式”可能是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中最为重要的概念。直至今日,学界和业界一直是以一种相对随意的方式来使用“美国图书馆模式”(Model of American Library/American Library Model等)这个词语。在本研究中,所谓的“美国图书馆模式”被认为包括两层内涵:①公共、公开的理念,其中公开(Open-access)主要是开架制(Open stacks或Open shelves)和强调用户利用,而公共(Public)则更多凸显“以税收支持的公共性质”^①;②达到“公共、公开”理念的方法、技术和设备体系等实施手段^[64]。

两层内涵的区分有其实际意义。第一,我们一直以来倾向于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图书馆学”与“美国图书馆模式”看成是一个静止、固定的概念,但实际上,这一时期也恰恰是其发展最为迅猛、变化最为频繁的时期,而这些变化主要集中在第二个层面,即新式图书馆的方法、技术和设备方面,其理念是一以贯之的。第二,在美国图书馆模式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尽管①是这一模式的核心,但这一核心需要涉及观念与体制的改革,殊为不易,因此,先被各国所接受的,往往是具体的技术方法和办馆手段。

在下文的3.1中,还将解释这5个概念的提出过程。

3 历史分期:从专业交往到文化外交的历史变奏

3.1 从理论到应用

上述只是从构建层面,对理论基础进行了论述,更加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理论如何发挥

效用?具体来讲,这一理论基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中美图书馆交流史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1)在微观层次,笔者梳理出一份《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年表》,将所有相关事件、无论大小,均安置在对应时间轴的右端,并为每一个事件提取关键词;

(2)在宏观层次,在《年表》时间轴的左端,笔者利用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已有的研究成果,整理出中、美和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宏观政治、经济与外交互动;

(3)在中观层次,分析时间轴左(宏观)、右(微观)两端的关联。首先,根据已有材料,探索能否在书籍交流圈的视角下,尝试阐述不同时期左右两端的具体关系及其紧密程度;其次,根据左右两端的紧密程度,为每一个事件打分,分值从1到5,分别表示本事件与相邻时间轴上的宏观事件“完全无关”“较不相关”“一般”“较为相关”或“密切相关”;最后,根据中观层次的具体考察与紧密程度的分值,对(1)中的关键词进行修改,并将少数具有贯穿长时间段特征的关键词,提炼为3.2.3中的“核心概念”。

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中,宏观层次提供了大背景,微观层次提供了交流史实,中观层次则帮助我们展开历史时间的分析和解读;一般的关键词和“紧密程度”的分值帮助我们理解不同发展时期的基本特征,而核心概念则提供了总体性观察的切入点。

通过这种方式梳理下来,可以发现,中美图书馆的交流主轴实际上经历了从“微观”到“宏观”的舞台变迁。最为明显的是“紧密程度”的分值越来越高:在晚清到民国初年,两国的图书馆交流只是一种行业之间的交往行为,尽管也有庚子赔款退还等触及国家政治的事件,但其

① 有时候还经常加入第三个特征,即“由政府管理”,见:Martin L. A. Enrichment: a history of the public librar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 Lanham, Maryland & Oxford: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1998; Introduction. 另外,由于篇幅限制,关于“美国图书馆模式”的论述,可另见:肖鹏.从“美国图书馆模式”到“中国图书馆路径”的初步成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为分水岭的回顾与展望[J].图书馆建设,2018(2):23-28.

影响与范畴仍多局限于图书馆与图书馆学领域;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图书馆交流逐渐被视为文化外交的一种手段和一个方面,从这一时期开始,中美图书馆交流的相关资料、档案中,活跃的不仅仅是图书馆人的身影,以陈立夫、周以德(Walter Judd)、斯图尔特·冈姆(Stuart E. Grummon)等为代表的美中政治人物也开始介入。这种视角的变化,也要求我们在不同阶段的研究中,灵活转换和运用上文构建的不同层次的理论架构。

3.2 历史分期

确认了中美图书馆交流史的主要脉络之后,在下文中,笔者将通过四个时期的历史分段来描绘这一脉络,并试图简要叙述每一时期的历史发展、主要成就和基本特点。

第一个时期,是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以前,是“美国图书馆模式”开始被中国所接受、中国图书馆职业逐渐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交流以中国为主动一方,尽管也有发生如争取“庚子赔款退还”的事宜,但总体上还是以专业交往为交流的主要目的。

严格来讲,第一时期的考察可前推至晚清,而不仅限于民国。如此算来,这一时期有7个关键事件,它们乃是层层递进的关系:第一,晚清洋务运动之后,中国人开始零星接触笼统的“西方图书馆”概念,美国图书馆界发达的身影夹裹其中;第二,中国通过日本间接学习美国图书馆模式;第三,文华公书林的建立,它的出现意味着中国拥有了一个模板图书馆(Model Library),此处的模板图书馆是指,在某国家或地区内,第一处完全依照美国图书馆模式所建立的图书馆,它们往往成为美国图书馆模式在当地传播的中心,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如后来美国图书馆协会在墨西哥城建立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图书馆^[65];第四,第一代图书馆学家留美学习,在韦棣华、克乃文等人支持下与美国图书馆界初步建立联系;第五,以新图书馆运动为代表的美式图书馆宣讲兴起,从此,美国式的图书馆“逐

渐靡布全国,与民国初年步武日本之趋势对立”^[66];第六,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的建立,通过仿习美国图书馆学的教育制度,韦棣华等人建立了第一个专门的图书馆职业教育机构;第七,庚子赔款退还并部分用于中国的图书馆建设。

第二个时期,以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为标志,以1937年前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为止,是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专业交往的黄金期。随着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中国图书馆员有了统一的行业组织,找到一个和美国图书馆协会平等对话的位置,建立起组织间的交往。更重要的是,从此中国图书馆界拥有成型的专业网络,此后,中国对美国图书馆业界的仿习是系统化的,出现专门的组织、刊物和措施来推动全国图书馆的建设与馆员的进步。尽管这一时期的主动方仍是中国,美国图书馆界也出现较多的回应和互动,中美图书馆事业之间建立了多种交流渠道,包括会议交流、专家咨询、人才互访、留学、行业刊物的流通、译书与介绍、出版物互换与代购、展览与演说、书目编纂与交换等等。

抗战前中美图书馆交流的最大成就,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国已经建立起一个具有浓重美国色彩的图书馆事业体系。以往认为在这一阶段已经逐渐实现了“本土化”,细细考察,会发现这种说法可能未必准确。应该说,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图书馆体系在技术方法(如分类、编目、索引等)上实现了本土化与创新创造,在服务工作(如参考咨询、青少年服务等)上发展有限,设备基础(图书馆用品、设备等)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欧美,最重要的是,对“公共、公开”这一美国图书馆模式之核心内涵还缺乏深入的实践。

这一时期,北美东亚图书馆也出现了重要的发展,尽管在此之前的数十年,美国图书馆界已经开始收藏中国藏书,唯其到了这一时期,以裘开明为代表的图书馆学家才通过“反哺”的方式,为东亚图书馆的管理奠定了基本的业务模式,初步解决了美国图书馆系统下的中(日/韩等)文文

献的分类、编目等问题,并通过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等机构实现了这一“业务模式”在北美的扩散和传播。

第三个时期,是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开始到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取得胜利、反法西斯战争出现重大转折为止。随着战争与政治形势的日益紧张,中美图书馆关系出现了专业交往向文化外交的重心渐变。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美之间的交流渠道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第二个时期形成的多种交流渠道,有不少已经逐渐封闭,中美图书馆交流的主题逐渐向“援助”“救助”靠拢,关键性事件包括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籍运美、“赠书助中国”(Books for China)运动等,尤其后者,在当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而除了国家图书馆、图书馆协会层面的组织性援助,美国民间和基金会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援助也是普遍存在的,如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为深陷通货膨胀的文华图专,就陆续提供了一些经济上的支持,希望这些资助能够给予处于战火中的中国和文华图专“一些希望和新的勇气”^[67]。

到1941年5月,当罗斯福总统最终将中国纳入到租借法案的适用范围之内,并逐步制定相关的战略物资计划时,与之相对应的,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也开始针对中国制定文化支援规划。在1941年11月的常规会议上,当时的负责人之一、曾经担任过大连领事的冈姆初步提出一个对华的文化项目,这个项目涵盖了后来我们所熟知的技术专家派送、人才交换计划,还有录音机和缩微胶卷等物资援助。这时卡尔·米连才真正产生对中国的兴趣,在这一时期与袁同礼的信件交往中,他积极表示图书馆和图书馆员职业能够在对华的文化项目中扮演重要的角色^[43]。此后,随着文化关系司对第一任中国文化专员费慰梅的派出,中美图书馆的行业交往逐步与文化外交的总体政策并轨。在这一时期,该项目在图书馆领域比较实质性的工作之一,是截止到1943年底,美国通过缩微胶卷向重庆送去了大量的科学与技术类图书、刊物,缩微胶卷,成为战

时中国高校接触西方新书刊的主要途径。

第四个时期,从1943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是中美图书馆交流的复兴和夭折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开端,已经能够看到抗战胜利的曙光,因此,中美双方提出了多个图书馆复兴规划和初步尝试。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文本分别是由袁同礼和费正清共同起草的《中美智识关系备忘录》^[68]和由著名生物学家萧采瑜提出的《战后我国图书馆复兴与计划意见书》^[69],尤其是前者,成为这一阶段美国文化关系司和战时信息处针对中国展开一系列文化项目的重要参考。在这一时期,无论是上述计划的规划抑或是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具体行动,都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整体策略的一部分,如1944年3月,在美国战时信息处的授意和要求下,美国图书馆协会举办了“中国图书周”(China Book Week),动员各个图书馆参与相关的中国项目^[70]。这一时期,取得比较大成就的是在美国国务院支持下,美国图书馆协会对接中国战时图书征集委员会展开的赠书工作,中国当时几乎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和重要的学术机构,都曾经接收过来自这一项目的馈赠^[71];其他机构,如作为在华基督教大学合作组织的“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等,也尝试为中国的图书馆重建做出贡献。可是,由于中美关系的波动与解放战争的爆发,很多规划的内容并没有真正展开,“图书馆复兴”的宏大理想夭折于无形。

值得一提的是罗斯福图书馆的筹划。这所图书馆的筹划建议在1945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是为了纪念当年4月去世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而建立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史一个深意味的句号:其筹备意味着,国民政府已经意识到图书馆的文化功用与象征意义,并积极地将之运用到与美国的交往之中;但这所从未正式开放、只在后期提供了阅览服务功能的国立罗斯福图书馆,也象征着中美关系的逐渐对立^[72],友好交往的大门缓缓关闭,两国的图书馆关系在总体上

进入了停顿期,其后很长时间,除了比较特殊的情况和领域,美国仅与中国台湾等大陆之外的地区保持图书馆交流。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剧变,也成为后来美国东亚图书馆真正崛起的前奏,尽管其黄金发展期在1960年前后才到来,但二战后的发展趋向已经日渐明显,例如,创建于1949年以前的东亚图书馆有14所,而其中创办于1945到1949年间的就有4所^[73]。

4 结语

本文是关于民国时期中美图书馆交流史的

序论式研究,在文献爬梳的基础上,构建了对应的理论框架,并借此理论指导研究方法,划清历史分期。在这三项工作中,理论构建的意义最为重要——尽管本文做出的只是初步且拙劣的尝试,但笔者相信,在坚持学科立场的基础上引入外部的成果与视角,本领域图书与图书馆史的研究有望焕发出新的魅力,成为提高图书馆学在跨学科中的话语权,深化学界对“图书馆”本质理解与价值认知的重要路径。

致谢:感谢联合培养导师安·布莱尔教授的指导意见,以及柯平、刘炜、卓连营、叶鹰、范并思等老师的建议和指正。

参考文献

- [1] 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Zuo Yuhe. From Sibu to Qike: academic divis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Chinese knowledge system [M].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4.)
- [2] 张仲民.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Zhang Zhong-min. Plant the melons and reap the beans: reading culture and accepting politics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 Beij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China), 2016.)
- [3] 辛德勇.中国印刷史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Xin Deyong. A research on Chinese printing history [M].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6.)
- [4] 白谦慎.吴大澂和他的拓工[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 (Bai Qianshen. Wu Dacheng and his rubbing workers [M]. Beijing: Dolphin Books Press, 2013.)
- [5] Brokaw C J. Eating rice from bamboo roots: the social history of a community of handicraft papermakers in rural Sichuan, 1920 - 2000 (review) [J].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011, 71(2): 381-389.
- [6] (美)安·布莱尔.工具书的诞生——近代以前的学术信息管理[M].徐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Blair A M. Too much to know: managing scholarly information before the modern age [M]. Xu Jian,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 [7] 王学典,王钢城.从追求致用到向往求真——四十年代中后期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动向之一[J].史学月刊,1999(1):59-67. (Wang Xuedian, Wang Gangcheng. From practice use to the pursuit of truth—the changing trend of history research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Late 1940s [J]. Journal of History Science, 1999(1): 59-67.)
- [8] 程焕文.百年沧桑——世纪华章——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回顾与展望[J].图书馆建设,2004(6):1-8. (Cheng Huanwen. Vicissitudes of a century brilliant work—reviews and prospects of the undertaking of Chinese library of the 20th century [J]. Library Development, 2004(6): 1-8.)
- [9] 范并思.图书馆精神的历史缺失[J].新世纪图书馆,2004(6):3-8. (Fan Bingsi. The historical deficiency of library essence [J]. New Century Library, 2004(6): 3-8.)

- [10] 范凡. 中日图书馆学65年交流史(1899—1964)序说[J]. 图书情报知识, 2015(6): 4-9. (Fan Fan. Introduction to 65-year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in Library Science from 1899 to 1964[J]. Document,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15(6): 4-9.)
- [11] 程焕文. 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Cheng Huanwen. The history of library academic ideology of late Qing period.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2004.)
- [12] 谢欢. 存史观变: 图书馆史领域的“十七年史”研究[J]. 图书馆建设, 2015(3): 4-7, 12. (Xie Huan. Preserving history data and observe the change: study on the 17-year (1949-1966) history in the field of the library history [J]. Library Development, 2015(3): 4-7, 12.)
- [13] 宋建成. “中华图书馆协会”[M]. 台北: 育英社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80. (Song Jiancheng.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M]. Taipei: Yuyingshe Cultural Affairs., In.c.1980.)
- [14] 孟雪梅.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图书馆研究(1868—1952)[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07. (Meng Xuemei.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christian university library from 1868 to 1952 [D]. Fuzhou: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2007.)
- [15] 严文郁. 中国图书馆发展史: 自清末至抗战胜利[M]. 新竹: 枫城出版社, 1983: 229-243. (Yan Wenyu. The history of libraries in China: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end of Anti-Japanese War[M]. Xinzhu: Fengcheng Press, 1983: 229-243.)
- [16] Yu P C, Davis D G. Jr. Arthur E. Bostwick and Chinese library development: a chapter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J]. Libraries & Culture, 1988, 33(4): 389-406.
- [17] 吴稼年. 中华图书馆协会对外交流的首件大事——鲍士伟考察中国图书馆85周年[J]. 图书馆, 2011(2): 30-34. (Wu Tunian. The first great event of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J]. Library, 2011(2): 30-34.)
- [18] 张书美. 美国庚款退还与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J]. 山东图书馆学刊, 2009(4): 51-54. (Zhang Shumei. The boxer refu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librarianship[J]. The Library Journal of Shandong, 2009(4): 51-54.)
- [19] 程焕文.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 沈祖荣评传[M]. 台北: 学生书局, 1997. (Cheng Huanwen. A biography of Samuel T.Y.Seng: the father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China[M]. Taipei: Student Book Co., Ltd, 1997.)
- [20] Zhou Y, Elliker C. From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books for China programs during World War II[J]. Libraries & Culture, 1997, 32(2): 191-226.
- [21] Tsay M Y. The influence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on modern Chinese librarianship, 1924 to 1949[J]. Asian Libraries, 1999, 8(8): 275-288.
- [22] Cheng H W. The impact of American librarianship on Chinese librarianship in modern times (1840-1949)[J]. Libraries & Culture, 1991, 26(2): 372-387.
- [23] 吴稼年. 中国近代图书馆“西学东渐”阶段的学术思想特征[J]. 图书情报知识, 2009(5): 64-71. (Wu Tunian. Learn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western culture communication to China in modern library[J].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 Knowledge, 2009(5): 64-71.)
- [24] 吴稼年. 美国图书馆思想对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发展的影响[J]. 晋图学刊, 2006(5): 73-79. (Wu Tunian. Effect of U.S.A. Library thought on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brary of China[J]. Shanxi Library Journal, 2006(5): 73-79.)

- [25] 陈英. 基于美国影响的民国图书馆事业研究[D].湖南:湘潭大学,2016.(Chen Ying. The librarianship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the influence of American librarianship[D].Hunan:Xiangtan University,2016.)
- [26] 李刚,等.制度与范式: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考察(1909—2009)[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126—169.(Li Gang, et al. System and paradigm: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from 1909 to 2009 [M].Beijing:Science Press. 2013:126—169.)
- [27] 麦群忠. 中国图书馆名人辞典[M].沈阳:沈阳出版社,1991.(Mai Qunzhong. Chinese library celebrity dictionary [M].Shenyang:Shengyang Press, 1991.)
- [28] 顾烨青. 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人史料建设:现状与展望[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3):5—14.(Gu Yeq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Chinese modern Library Science: status and prospects [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10(3):5—14.)
- [29] 范凡.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人[J]. 图书与情报,2011(1):131—133.(Fan Fan. The library scholars in the republican era of the China [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2011(1):131—133.)
- [30] Jing L. The genesis of the modern academic library in China;western influences and the Chinese response[J]. Libraries & Culture,2004,39(2):161—174.
- [31] Tu K P. Transform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knowledge and values: the shaping of library service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D].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6.
- [32] 徐鸿.美国模式对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教育的影响——以文华图专为例[J].天禄论丛,2012,2(2):168—170.(Xu Hong.The influence of American model on the education of modern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a case study of Boone Library School [J].Journal of Society for Chinese Studies Librarians, 2012,2(2):168—170.)
- [33] 周洪宇. 不朽的文华 从文华公书林到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Zhou Hongyu. The immortal Boone—from Boone library to Boone Library School [M]. Wuhan: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3.)
- [34] 彭敏惠.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创建与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Peng Minhui.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Boone Library School [M].Wuhan:Wuhan University Press,2015.)
- [35] 郑丽芬.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2015.(Zheng Lifen.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D].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2015.)
- [36] 刘劲松. 抗日战争与缩微胶卷输入中国图书馆[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13,22(6):95—101.(Liu Jinso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input of microfilm into libraries of China[J].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2013,22(6):95—101.)
- [37] 周欣平. 东学西渐:北美东亚图书馆1868—2008[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Zhou Xinping. Collecting Asia: East Asian libraries in North America, 1868—2008 [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12.)
- [38] 吴文津.美国东亚图书馆发展史及其他[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6.(Wu Wenjin. History of East Asian libraries in America[M].Taipei:Linking Publishing,2016.)
- [39] 余英时.史学研究经验谈[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201—206.(Yu Ying-Shih. Experience of historical studies[M].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Group,2010:201—206.)
- [40] 苏精. 从换书局到出版品国际交换处——早期中国交换机关小史[J].图书馆学与资讯科学.1978,4(2):180—183.(Su Jing. From “exchange bookstores” to “the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publications” [J].

-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978, 4(2):180-183.)
- [41] 袁斌. 馆史钩沉——原国立中央图书馆出版品国际交换处纪事[J]. 新世纪图书馆, 2007(5):86-87.
(Yuan Bin. Profile of publications international exchang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J]. New Century Library, 2007(5):86-87.)
- [42] Fairbank W. America's Cul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1942-1949 [M].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7.
- [43] Kraske G. Missionaries of the books: the American library profession and the origins of United State cultural diplomacy [M].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85.
- [44] 胡文涛. 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在中国的运用[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Hu Wentao. 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and its practice related to China [M].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2008.)
- [45] 孙洋. 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文化援助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 2012. (Sun Yang. Study on American cultural assistance to China during the Pacific War [D]. Changchun: Jilin University, 2012.)
- [46] 程焕文. 跨越时空的图书馆精神——“三位一体”与“三维一体”的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和裘开明先生[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2(5):60-64. (Cheng Huanwen. Library spirit beyond space and time [J]. The Journal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2(5):60-64.)
- [47] Huang G W. Miss Mary Elizabeth Wood: pioneer of the library movement in China [J]. 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 1975, 1(1):67-78. (Huang G W. Miss Mary Elizabeth Wood: Pioneer of the Library Movement in China [J].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975, 1(1):67-78.)
- [48] 徐雁. “读者为本, 书籍至上; 学贯古今, 古通中西”——克乃文在华首开图书馆学课程百年纪念(上) [J]. 图书馆, 2005(5):46-50. (Xu Yan. The course of library science first set by Herry Clemons in China [J]. Library, 2005(5):46-50.)
- [49] 张秀民. 袁同礼先生与国立北平图书馆[J]. 北京图书馆馆刊, 1997(3):53-59, 92. (Zhang Xiumin. Yuan Tongli and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J].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1997(3):53-59, 92.)
- [50] Sullivan P, Carl H. Milam and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M]. New York: H.W. Wilson, 1976.
- [51] 郑永田. 美国图书馆学家鲍士伟思想初探[J]. 图书馆建设, 2010(9):109-113. (Zheng Yongtian. On American librarian Bostwick's thought of library science [J]. Library Development, 2010(9):109-113.)
- [52] 程焕文. 裘开明年谱[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Cheng Huanwen. Qiu Kaiming's chronicle [M].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8.)
- [53] Howsam L.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54] White H.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 [55] Zerubavel E. Social mindscapes: an invitation to cognitive sociology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56] Wallerstein I.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with a new prologue [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 [57] Darnton R.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J]. Daedalus, 1982, 111(3):65-83.
- [58] 利玛窦. 利玛窦书信集(下) [M]. 罗鱼, 译. 台北: 光启书社, 1986:277. (Matteo Ricci. Letters of Matteo Ricci

- (Volum 2) [M]. Luoyu, trans. Taipei: Guangqi Bookstore, 1986: 277.)
- [59] 沈国威. 时代的转型与日本途径 [G] // 王汎森, 等.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 台北: 联经出版社, 2007: 243-244. (Shen Guowei. The transition of times and the Japanese approach [G] // Wang Fansen, et al.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Chinese modern ideological history. Taipei: Linking Press, 2007: 243-244.)
- [60] Boar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China (Agenda B-11) [A]. Urbana: ALA Archive (China Program, 7/1/51, Box 1).
- [61]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Orient and Southwest Pacific, suggested for incorporation in the report of the Board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Urbana: ALA Archive (China Program, 7/1/51, Box 1).
- [62] Letter from Carl H. Milam to Dr. Abbot. 1938-11-1 [A].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rchiv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ervice., Record, 1868-1988, Box 1).
- [63] 李智. 文化外交: 一种传播学的解读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4-25. (Li Zhi. Cultural diplomacy: a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24-25.)
- [64] 肖鹏. 从“美国图书馆模式”到“中国图书馆路径”的初步成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为分水岭的回顾与展望 [J]. 图书馆建设, 2018 (2): 23-28. (Xiao Peng. From “American Library Model” to the birth of “Chinese Library Approach” [J]. Library Development, 2018 (2): 23-28.)
- [65] Héctor J. Maymí-Sugrañes.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in Latin America: American librarianship as a “modern” model during the Good Neighbor Policy Era [J]. Libraries & Culture. 2002, 37 (4): 310-311.
- [66] 刘国钧. 现时中文图书馆学书籍评 [G] // 史永元, 张树华. 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 [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 16. (Liu Guojun. Review on current Chinese books of library science [G] // Shi Yongyuan, Zhang Shuhua. A Collection of Liu Guojun's papers on library science. Beijing: Bibliographic Document Press, 1983: 16.)
- [67] Boone library school. 1941-10-31 [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Libraries (United Board Archive, Box 3)
- [68] Memo: Sino-American intellectual relations. 1942-12 [A]. Urbana: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rchives (China Project, Box 1).
- [69] A project for reestablishing libraries in China after the War. 1943-5-8 [A]. Urbana: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rchives (China Project, Box 1).
- [70] Olga M. Peterson. So you're celebrating China Book Week! [J]. ALA Bulletin, 1944, 38 (1): 11-13.
- [71] A repor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books donated by institutions in U.S. A. 1947-12-31 [A]. Urbana: ALA Archive (China Program, 7/1/51, Box 1).
- [72] 杨玉麟. 民国时期“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研究 [J]. 四川图书馆学报, 1997 (6): 67-72. (Yang Yulin. A research on the National Roosevelt Library in the R.O.C period [J]. Journal of the Sichuan Society for Library Science., 1997 (6): 67-72.)
- [73] 周原. 美国大学中的东亚图书馆 [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5 (6): 15-25. (Zhou Yuan. The Eastern Asia libraries in the America universities [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05 (6): 15-25.)

肖 鹏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广东 广州 510006。

(收稿日期: 2017-10-30)